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己
信息 知识 观念 须时时更新

读者参考

丛书
39

生命中的软与硬

◎自己创业，还是就业？ ◎国外轿车逐鹿中国市场

◎当代名人世界最著名的三角恋爱

◎农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家

◎我为什么喜欢西洋音乐 ◎从最近的地方寻找快乐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中的软与硬/《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6
(读者参考丛书/39 林雨主编)
ISBN 7-80668-012-8

I. 生...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486 号

生命中的软与硬

读者参考丛书(39)

2001 年 6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梅 川 洋 叶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7-80668-012-8/Z·3

定价:10.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39)

生命中的软与硬

目录

樊纲、张维迎改革对话录	1
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论争	6
外来兼并与“民族斗争”	9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1
50年：中国与世界	14
格林斯潘谈美国经济走势	17
没有领导的美国大选	19
中国为什么要加入 WTO	23
国外轿车逐鹿中国市场	26
养辆私家车花费知多少？	34
股民：监管年说监管	29
股市十年谁赚钱	33
股市三大变数，风险不可不防	35
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	36
证监会确定首家开放式基金试点单位	154
2001年，家庭投资焦点在哪里？	37
买保险应注意八点	38
购房人六大法律关注	39
我是农民，我是 CEO	40
13岁，李泽楷去了美国	45
子承父业当总统的小布什	49
李光耀的转变	54
戈尔巴乔夫又露面了	76
临刑前的胡长清	56

李银河与你“谈性说爱”	58
“无话可说”的婚姻	
——邓文迪与默多克	61
当代名人世界最著名的三角恋爱	62
关于男女关系的三十二个比喻	70
女儿,我佩服你	73
美国女性不做女强人了	75
影响曼德拉一生的女性	77
父亲的愿望	80
美丽的无奈	
——平民克林顿的第一天	81
从最近的地方寻找快乐	82
生命中的软与硬	83
中国电视四大病	85
华人导演在欧美影坛	90
从畅销小说到电影	92
因特网在中国	94
震撼的不只是音乐	96
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99
生于 1980 年的男男女女	102
中国私企老板众生相	108
不可忽视的新“返贫”现象	111
性学教授细察“红灯区”	114

色情业为何愈演愈烈	117
厦门“二奶村”探秘	120
自己创业,还是就业?	123
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	122
从科学中心的转移看科教兴国	124
农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家	126
无法证明的“上帝”	128
对于作家命运的思考	133
作为寓言的爱情小说	135
罗曼·罗兰的崇拜与骂名	132
编辑分家,利耶? 弊耶?	137
电子图书冲击纸介传媒	138
传统图书馆还有用吗?	141
阅读:怎么读都对	140
她带美国人读书	142
关于中国教育的世纪对话	145
高校何不实行宽进严出	152
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端	155
异国求学,容易吗?	156
美国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	157
日本教育:残酷的“人生预选赛”	164
居里夫人的家教艺术	161

我们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	168
磁悬浮离我们有多远?	171
五光十色的电影音乐	175
别把格莱美太当事儿	131
我为什么喜欢西洋音乐	179
文化名人谈麻将	183
德国专家:中国足球人口太少	182
美国陈兵关岛虎视台海	188
21 世纪最能引发战争的六大因素	190
硬件大好,软件太糟	193
进一步的觉悟	194
周信芳何故投靠黄金荣	196
日本投降仪式为何在军舰上举行	174
在“申报世界遗产热”的背后	200
我国新增 4 项“世界遗产”简介	204
“世界遗产”的由来	204
十五计划是怎样制定的	205
制度创新:西部发展的重中之重	205
三峡移民政策有调整	107
科学家建议把陕西建成西部生态省	206
我国耕地面积没减少	206
中国绝不放弃提高农业补贴的权利	28
入世后中国将增产蔬菜减产粮食	44
中国 5 年后年进口石油量将达 1 亿吨	116

私企漠然看待人世	113
今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相对稳定	206
今年货币政策“稳健”依旧	160
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族	144
我国并没有出现“黑社会”	207
近五成居民赞成婚前财产公证	207
 上海:中国的外企新都	 208
晋商的故事:足迹遍天下	212
城市孩子在“退化”	217
人气最旺的 10 座城市	218
 澳门的葡人与土生葡人	 220
“瘫痪战”:台独又出新招	222
 中国货在美国	 223
美国:你独特吗 中国:你考高分吗	226
亚洲人自画像	227
在德国的故事	229
 各具特色的欧美人	 230
精确与含混——大和民族心性趣谈	232
惊世骇俗是荷兰	235
美国人住房讲实用	239
 沉醉自然和音乐改善睡眠	 240
春夏之交话午睡	240
警惕,失眠背后的抑郁症	241
睡久也会致癌?	241
体育锻炼能纠正心理缺陷	242
中年知识分子保健五戒	243

头发早白者须警惕骨质疏松	243
出现“记忆障碍”怎么办	243
家电是儿童白血病的诱因	119
养生宜吃家常饭	244
五味与养生	244
不要“趁热吃”	93
吃辣椒:适量防癌,过量致癌	245
食豆腐并非多多益善	245
常吃鸡蛋不易得痴呆症	246
夏季也应当进补	246
 世界十大航天基地	 18
世界名城	195
家居装饰中的人际关系	247
多层住宅与高层住宅的比较	248
电脑产品有哪些标识规定	249
生活中的最佳时间	89
 船王与儿子	 13
落榜后的名人	48
语丝	55,72,91
旅游观念该变变了	79
世说新语	101,136
幽默画 无题	178
《清明上河图》何时景象	199
古龙说男女	211
欧洲人的早餐	234
拾石头	238

封面图片:水彩印象

(选自《池振明水彩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MULU

SHENGMIN

ZHONGDE

RUANYUYIN

DUZHECAN

CAOCONGSHU(39)

樊纲、张维迎改革对话录

□马 克

改革：任重道远

樊纲：中国的改革改的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的30年里形成的东西，那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

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不做这些事情，中国要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恐怕需要100年，做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也还得30年甚至50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客观规律。但改革不是为了一代人，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张维迎：30年计划经济，时间虽然不像前苏联那么长，但30年交织了几代人，形成了从最基本的产权制度到文化道德观等一整套体系，借用王蒙的话，是一锅“坚硬的

稀粥”。

为什么要建立计划体制，是为了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赶超。当时的人们相信以国家出面，用政府主导的形式，把所有的资源、甚至人的思想都集中起来，能够最快地实现工业化变革。

实践证明，它破坏了对个人的激励原则。当民众没有创业的积极性、社会因为缺乏竞争而死气沉沉时，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工业化就无法持续。事实上，计划体制不但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为转型带来了更多的障碍。

回顾最近二十多年走过的路，可以说改革的方向一直在探索之中。改革初期我们的想法只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一点市场条件，所有制问题就更没有提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咱们的体制没问题，只不过让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给耽误了，只要把能人放到计委，再引入计算机设备分析投入产出，计划经济就能运转。回头看去，当时最激进的改革派也没能把改革方向看得很清楚。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先声

樊纲：建立市场经济的概念到了九十年代初才有，但直到现在，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认识仍未统一,因为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我们可以看到,资源配置还在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向某些企业倾斜,产权改革在很多地方还是步履维艰,明明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但由于一些人坚持,大家不敢轻举妄动。

张维迎:对企业家而言,如果旧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个人财产的合法性就仍然成问题,对个人产权的保护就仍然成问题。在这种预期下,人们的行为就会扭曲,就容易短期化,就会考虑用金钱换取权力来保证安全。

樊纲: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两个凡是”,第二次突破了“姓社姓资”,1997年“十五大”前后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它仍在进行中。1997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了不少,宪法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是思想还远没有彻底解放,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改革。

张维迎: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了太多的枷锁,并且对它们顶礼膜拜。好在改革以来每隔几年枷锁就要被砍掉几条,人们的思想随之解放一次。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在国外学者看来都是常识。

改革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樊纲: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

探索,不是探索怎么走,而是往哪儿走。方向不明确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或者说一大特点。

一方面,方向不明确总比明确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的摸索,死胡同一个一个地走完,南墙一堵一堵地撞过后,改革正在逐步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产权改革,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不可能人为创造出另外一套东西。

我是相信经济规律的,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中国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10年前,经济学家们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根本没有人听,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与此同时,经济没有死、社会也没有乱嘛!

没有谁能够左右改革的方向,改革实际上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最初是邓小平打破坚冰使变革得以开始,但越往后越是下面推着上面走,实践推着政策走。

对未来,我一直比较乐观,因为我相信见了黄河、撞了南墙之后,我们的政策会做出调整。只要大家不想中国垮掉、真心地希望国富民强,中国就会按经济规律办事,虽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成本可能比较高。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走势已经比较明朗了,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速度正在加快。我认为中国陷入动荡或者像印度那样的制度性腐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

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像企业与企业一样,国与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国家和企业一样,面对竞争压力,要想生存就得改进效率,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激发民众积极性的体制。

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其实观念问题不单是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可怕的是,观念可以变成斗争的工具。最简单的例子,你说这个企业应当卖掉,虽然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依然会借此把你赶下台。所以,一个无效制度的最可怕之处不在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它会创造出维护这一制度的人。这样就使这个制度改起来非常难。

没有份额的变化就 不是真正的改革

樊纲:历来如此,不仅中国。这不能只用经济学,而要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改革难就难在有人的处境会因此而变坏。尽管全社会总的利益增加后我们可以给那些受损失者补偿,使他们的利益从绝对量上不致下降。但在相对量上,权力失去了、地位失去了、相对的高薪失去了,而在一些人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改革人们的思想认识,但你改变不了既成的利益格局。官员就是不愿意失去权力,国企职工就是不愿意下岗。

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

张维迎:旧的既得利益是确定的,变革带来的潜在利益可能非常大,但是它的受益者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旧利益格局的力量就要比追求新体制的力量强。因此,改革就一定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

樊纲: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就是一部分人可能会相对较少地从新体制受益。比如岁数较大的人,已经退休的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

事实上,经过 20 年的改革,由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50 岁以上的人生活水平比起过去仍然提高了一大截。而年轻人是认同改革、认同收入差距、认同市场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光明的前途。这也正是中国稳定的原因之一。

张维迎: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水平,一个是相对水平。在效用函数中,我的效用不仅来源于我的收入,还来源于你的收入。

即使整体而言蛋糕变大了,每个人分得的那一块也变大了,但分配比例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打个比方,原来一共有 100 块钱,我拿 90,你拿 10 块;现在有 1000 块钱,我拿 400,你拿 600,对我来讲,收入是增加了几倍,但在感觉上会觉得还不如原来拿 90。

樊纲:所以不可能对既得利益者做到完全的补偿,相对水平必然

要下降。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把收入分配办法改变过来。

在传统体制下,只要是国有的,就能享受到优惠和特权。国企职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铁饭碗,厂长经理们无论企业盈亏都可以升迁,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变成按效率来配置资源、分配收入、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一切在过去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人,一切自身效率低下、靠体制保护维生的企业和部门,都将是这场变革的受损者。如果还是我拿 900 你拿 100,那么改革就还没有完成。

张维迎:没有份额的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改革。补偿是另一回事,补偿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如果补偿的结果是你的状况比以前变得更坏,那你肯定不会接受,这是交易成立的前提。

现在,我们的社会资源被大量浪费了,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对既得利益者进行补偿,以换取他们不至过多地反对把社会资源交出来。这就像两口子离婚,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提出房子可以留给你,每月再给你若干生活费,这样婚就可以离成了。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改变了他们实现利益的方法,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麻烦在于补偿标准怎么定,有权力的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强,此外还可以通过寻租自我补偿,普通职工就缺乏谈判能力,只能由上

面来定,因此交易的公平性就成了问题。

樊纲:这就是我才没讲完的那层道理。我们这个制度所能做到的补偿,就是使你的绝对收入不下降。改革的难点,就是它不能使人人受益,这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两回事。生活水平大家都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生活水平也比 20 年前好。但这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他们肯定大大下降了。因此,进行补偿可以减小改革阻力,但是无法消除阻力,因为你不可能在相对量上也作出补偿。

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 经济的权力

张维迎: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旧体制下,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改革就是把这个金字塔型的单一利益结构变成利益主体多元化,选择多元化的多元利益结构。虽然我不当官,只要我富有,你能享受到的我都可以拥有。

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权的人总能通过操纵改革进程补偿自己,权力货币化后,他们获得的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多了。比如官商现象,官员寻租设租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能力范畴了。

你原来获得的利益有没有合法性,这一点暂且不论,我们讲改革,就一定要尊重既得利益。剧烈

的变革，结果往往不如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历史没有飞跃，单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就需要很长时间。

樊纲：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官商又挣钱、又舍不得权，利用权力经商、利用经商谋权，挣钱归自己、亏损给国家。这就是典型的转轨期腐败。经济学家张五常多次提醒说，中国不能掉进“印度陷阱”，所谓“印度陷阱”，就是旧体制不变的同时又利用新体制牟利。改革理论越是不彻底，越是有观念上的障碍，越容易形成制度化的腐败。因此本次思想解放是最基本的，先把产权关系理顺。

张维迎：如果产权改革能够完成，就不用担心制度化腐败了。否则，像印度那样，私人可以办企业，但举手投足都要政府官员批准，东西是你的，干什么得听我的，这不等于你有了财产权。

问题是这种权力本来就不该他所有。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利，就像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我多次讲到审批问题，如果把审批统统废除了，腐败至少减少50%，GDP至少增长30%。

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

的严肃性，越过这一点，政府想有所作为，副作用就很难避免。

樊纲：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已经取代国企改革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这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这一点是必须提出警告的。政府不在大小，而在于干什么。如果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抓经济管企业上，那一定会导致低效，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激化社会矛盾。

199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市场中的政府》，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七八年，但是我仍然愿意在这里重复其中的主要观点，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

樊纲 1953年生于北京，曾先后任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等学校求学深造，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改革基金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博士在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199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博士在企业理论等领域有独到的见解。

（摘自《南方周末》）

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论争

□张剑荆

由吴敬琏教授的观点引发的股市论争,随着五位经济学家的联手反击而达到了高潮。在详细阅读了吴教授的相关言论及五位经济学家的反驳后,笔者产生了一种感觉:要认真讨论一个问题何其难也!尤其是在当事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媒体把意见诉诸公众的情况下,“对话”往往沦为“作秀”。只要比较一下对立双方的言论就能看出,五位知名学者对吴先生论题的误解是明显的。他们把后者的一系列言论,概括为“要不要(取消)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实际上,只需读一遍吴先生的文章便清楚,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股票市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读到一篇建议取消股市的文章。由于存在着这个严重误解,他们的所谓反驳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一百位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百种以上的观点,分歧是常态。没有谁的意见是不能批评的。

批评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家显然认为自己是站在“现代”市场经济推进者的立场上的,他们把自己视作中国股市的“保护神”和“慈父”,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的推进者,一位批评者概括说,这场争论“涉及到

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根据这样的自我定位,有人对吴敬琏总是对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地位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一直采取“泼冷水式的冷漠关爱”表示难以理解。吴敬琏先生素有“吴市场”之称,而今日竟被冠上“反市场”的帽子,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认为吴敬琏反市场的人是怎么理解市场经济的呢?他们的“正确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但是从他们对股票市场的论说上,可以看出一点影子,有人说“股市发展的历史就是投资者钻空子、政府和立法单位堵空子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论点描述的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从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来说,这个论点不能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结论,则是成问题的,他们说,制度形成的这种特点必然使这个过程“带来不规范,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此,吴敬琏先生不应当采取“冷漠的关爱”,而应当“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他们的意见是,不能把规范问题提得太突出。

这种看起来“宽容”的态度颇能打动人心,但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观点。市场固然要在诸多主体的博弈中形成完善,但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的形成,需要各个主体“权力”(这里对权力的定义只是指资源禀赋状况)的大致均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博弈才能取得大致公正的结果。而且,即使有了这个前提,公正的、正常的结果也不是自动、自然地浮现出来的,还需要某种“矫正的正义”。稍微对我国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目前的市场是一个权力落差很大的市场。即使那些都在钻空子的投资者,其权力也有着巨大的落差,有些投资者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制订规则,而有的投资者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大户们制订的规则,徒唤奈何。比如一再曝光的上市公司编造虚假信息问题。红光公司靠编造虚假信息上市,上市后继续做假账,还有大庆联谊、蓝田、郑百文等都大规模地制作假账。这种邪恶的行为,就是权力落差过大带来的,普通投资者只是在丑闻曝光后,才了解到事实真相。由于尚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残余,政府行为不规范,本来是“堵空子”的博弈参加者,有时却成为钻空子者的俘虏,于是存在着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现象。在这个不规范的市场,公司从上市开始就是一场巨大的盛宴,已经曝光的一些腐败案件,不少就与公司上市有关。至于上市后的幕后交易、编制虚假信息、黑庄操纵等更是屡屡见诸报端。

在此情况下,希望自然地、自动

地出现一个正常的现代市场,就显得幼稚了。如果不是不断地矫正市场主体的行为,那么,最终出现的市场就可能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与我们希望出现的市场经济南辕北辙。根据我的理解,吴敬琏先生对股市的评论,正是基于此。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的评论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应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分析这一现象,我感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仅仅靠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钻空子”者之间的博弈,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独立的、清醒的声音。

一位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斥责吴先生没有区分清楚“专家精神和平民意识”,没有区分清楚“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差别”,指责吴教授过分地为老百姓说话。如果我们考虑到上面所谈到的权力落差,那么可以说,为老百姓说话,强化平民的声音,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只有增加他们在博弈中的分量,提升他们在博弈中的权重,我们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走向正常,也就是吴教授多次描述的“有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成为畸形的。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把吴教授当作“钻空子者”吧。按照那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吴教授自己选择了经济学家精神、专家理性的对立面。我们不去争论什么是经济学家精神,但是,那位经济学家的区分倒是值得讨论,经济学家站

到平民立场上难道有什么错吗？

时代已经发展了，没有人再要求所有经济学家都以“全人类”、“中国”、“人民”的名义说话，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被认为是正常的了。经济学家可以为大款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在他们中间分出高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其职业要求他必须诚实，他在发表意见时，应当诚实地说出他的位置，而不是用“全体人”的名义把自己包装起来实际上只是某个集团的说客，这种不诚实与股票市场上编造虚假信息一样，都是欺诈。吴教授明确了自己的位置，说明他是诚实的。至于说经济学家的专家精神，我认为，在价值的天平上，一个经济学家，最关键的精神倒是“常识理性”。常识理性的发展，往往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在寂静无声的晚上，放弃了专家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时，比如在股市问题上，你确实与黑幕无关也不知道有严重的幕后操纵行为么？

给吴市场冠上一副“反市场”的帽子是经济学家的理性精神在指引我们的经济学家这样做的吗？对吴教授不抱偏见的人，都应当看到，吴教授仍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勇敢旗手。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经济。早在几年前，他就分析过我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阻力。他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初期改革的受益者、借改革发了财的人

们将成为反对进一步改革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他说：“改革越是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是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就越是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改革的对象。于是，这些人的保守的一面就会越来越突出。他们往往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包括“保护前期改革”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的可能。……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使改革走入迷途，妨碍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有悖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吴教授敏锐地预见到，相当一部分改革前期的受益者将成为要求“维持现状”、少讲规范和改革的社会力量，吴市场继续前进了，而他的有些同路人还停留在原地，他同他们的“博弈”就难免了。

吴教授也对理论争论的利益背景看得很清楚，他说：“利益关系毕竟是思想认识的基础。即使是理论上的争论，除了认识上的分歧所导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以下的一些理论分歧：通货膨胀究竟是有益无害，还是危害甚大；……以及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究竟应先发展、后规范，还是在规范的条件发展；等等”（吴敬

外来兼并与『民族斗争』

□何 仑

当 80 年代美国人惊呼日本在“购买美国”、“购买美国的象征”——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购买美国的灵魂”——哥伦比亚娱乐公司时,太平洋彼岸的我们很有些隔岸观火的兴致,甚至感觉这虽是日本人干的,但我们也出了口恶气——傲慢自大的美国人也有这种时候。然而时过境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克拉戈曼发现,如今美国公众对外资大肆并购美国公司的“态度相当平静”;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美国人的“一种自鸣得意——美国现在是如此丰满,以至于美国人感到实际上是在并购他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我们中的不少人还在类似 80 年代美国人对外来兼并的恐惧与“恶劣反应”(鲍·克拉戈曼语)中挣扎,特别是在预期我国入世后市场准入的限制将大大减少,被我们一些人称之为“狼”和“敌”(“与狼共舞”、“敌强我弱”成了与外资有关的时髦词汇)的外国资本将大量涌入“敏感”、“重要”领域的时候。

就目前来看,虽然由于限制,还没有出现过一起规模较大的外资兼并中国企业的案例(港台地区除外),但仅仅是外商在中国建立的独资或合资企业所引起的一些反应就够严重的了。“产业安全危机”、“赚中国人的钱”等,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媒体上最富于刺激性的标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享受中国市场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占领中国市场”等这类最正常的外国投资策略和战略均被升华为“民族斗争”。一些作者不无忧虑地一再忠告(实际上是在重复自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可的观点,以及所有一般的投资者从不否认的事实),不要以为外商是慈善家,他们是为了赚取或攫取利润。显然,忠告者们并非无知到想以此来暗示中国商人是慈善家,而是要强调一个“外”字和所谓“内外有别”,暗示作为“狼”和“敌”的外商不配享受与我们同等的国民待遇。

琰:《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我觉得,像吴教授这样明确地把理论争论同利益关系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多见的,吴教授有足够的诚实暴露自己的“利益关系”。

诚如批评吴教授的那些经济学

家所说,目前的这场论战的意义不只是一要不要规范股市的问题,而是再次提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公道自在人心。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